

南方论丛 / 张燕玲 张萍主编

兼美的文化批评

吕嘉健 著

新子學
船
PDG

出版社

其入则湛然清明
其出则处理万机

——庄子

题 叙

本书是一本文学文化批评的论文集，写作时间跨度约 10 余年，都为一集，大分为三：文学美学文化批评、地域文学文化批评、随笔文化研究。三者都与文学与文化批评有关，这都源于我的文学观念：我认为文学都是文化或曰人文主义的表现，研究文学必须从文化批评入手去解释，从文学去解释人性和人文意义内涵。关于“文化批评”或曰“文化研究”，这是当今国际文学批评的主流，它兼融各种文化资源，从大文化的视野去观照和研究文学现象，去阐释文学中深刻、复杂而广阔的人文意义。文化批评所吸取和运用的方法论夥矣！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我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或曰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新批评、原型批评等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可以看到我对多元文化资源例如地域民俗文化、历史传统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全球文化、自由主义思想、审美文化、性别文化、大众文化等等的吸取。多元文化资源的吸取和多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兼融并包”的策略进行处理，在文化立场上是解构—建构主义，在文学阐释方面是兼美批评，在文体方面是边缘化随笔写作。关于这点，可参看书中的《兼美论与中国兼美风格批评研究》和《论边缘化写作与随笔文化》两篇。

本书的书名表达了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兼美的文化批评”。它既是审美意义或曰意味阐释的，也是

文化意义生成和解释的，二者应当有机融合，和谐整合。为达此目的，应当运用兼美批评方法和文化批评方法的策略来思考。

由此我想到了 20 世纪两个学术大师的著名论述。柏林有一本广为人知的小册子《刺猬与狐狸》，哈耶克有一篇著名文章《论两种智力类型》，柏林把普希金类型叫做“狐狸”——才气焕发，游刃有余地驾驭千差万别的各种想法，把陀斯妥也夫思基的类型叫做“刺猬”——只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是如此深邃使得刺猬能借此洞悉不同现象背后统一的内在秩序。在他看来，歌德、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像狐狸，但丁、奥古斯丁、柏拉图像刺猬。哈耶克认为第一种智力类型的理想人物是就某个学科无所不知的“大师”，其突出特点是好记性，博学及超群的领悟与表述能力。另外一种类型则是“困惑型”，善于并且只善于用自己独特的认知框架去把握、理解种种信息。粗略地讲，“狐狸”精于“广”，“刺猬”精于“深”。如果把这些类型在现实中进行兼融杂拌，大略可以分出“大师型的狐狸”、“困惑的狐狸”、“大师型的刺猬”、“困惑的刺猬”四个类型。用这种观点和方法来反思，我当然根本不能和上述的大师相比，但从智力类型来看，我是属于狐狸还是刺猬呢？从我主张的“兼美的文化批评”观念和方法来看，我大概是属于低层次的“困惑的狐狸”吧？

本书所收的论文是我多年来文学文化思考研究的一些想法，没有把它们建构成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也许这就是“狐狸”习性的表现。但我又想到有人说过：目前中国大多数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学者他所有的成果大概用两万字的论文就可以概括清楚，我们还不可能进入到“原创性”创新的阶段，只是还在拿来主义的“次创新”状态。我们刚刚还在“失语症”

中徘徊，只能运用人类各种先进的文化资源对中国本土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批评，对人类人文文化的贡献还有待时日。我还想到钱锺书先生的研究以及他对体系的怀疑态度，因此本人多年来致力于对钱锺书先生的思想和文体加以研究，这大概也是对“大师的狐狸”的一种追随吧。

福柯说：“通过写作改变自我。”我是在寻找人文意义的过程中写作，相信阅读产生新思想的道理，相信强势知识应当是先进文化的表现，神往庄子所说的“其人则湛然清明，其出则处理万机”的境界，能入能出方为高人，希望能给思想一片飞翔的天空。但是我也深知，何逊诗云：“青山不可上，上一一惆怅。”由于生活、环境和智力的遮蔽，我对于思想，对于学术，对于文化的解释也许是乏力的，更由于“学术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深之故”（熊十力语），不是“大师级的狐狸”，当然就会有許多小狐狸先天的毛病，请各位读者谅解。

本书所收论文大多在各种刊物发表过，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是：《文艺研究》（北京，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钱锺书研究集刊》（上海，三联书店）、《文学自由谈》（天津文联）、《名著欣赏》（山西）、《当代文坛报》（广东）、《南方文坛》（广西）、《广西社会科学》等。在此对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和编辑致谢。在收入一辑地域文学文化研究论文时，我不禁回忆起当年和文友周兆晴、曾强一起研究探讨的情境，旧事虽往，情义恒久，且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收在这里，以纪其谊。

最后，我想用我在我的《文化逸品》一书中引用过的柳宗元的一段话来形容我的思想和我的边缘化写作：“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由此在多元文化的边缘化写作中“旁逸斜出”也。望各位方家有以教我。

本书出版得到广西大学梧州分校科研项目基金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是为序。

2003年8月16日

目 录

题 叙	1
兼美的文学文化批评	
兼美论与中国兼美风格批评研究	1
论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发现	29
论艺术的雅化	
——“月色能移世界”	49
英雄与异人	
——关于一种文化原型的比较批判	62
管锥篇：中国文化史元素的阐释巨著	75
“新古典主义”的启示	96
浪漫风情、感伤柔情与理想幻情	
——从《长恨歌》看中国浪漫情诗	107
爱情终结者的难题	
——杜十娘与安娜自杀意义的多角度阐释	123

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

地理环境对审美文化的影响	147
地理学文学略论	159
地理的文化意境	168
南方文化和南方文学的素质	180
论南北文化及珠江文化	196
近水则灵	

——中国南方文人文化性格的灵性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

.....	207
论新时期地域文学	219
论岭南文体	237
岭南文派如何化俗为雅	252

随笔文化与文化随笔

论边缘化写作与随笔文化	267
现代文化与现代小品文	282
文人随笔与小品文的意味	295
论“钱锺书文体”	308
旅行·游记·文化游记	323
表现随笔时代的聪明与美感	335
建构真正的随笔	347

兼美论与中国兼美风格批评研究

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

——赫拉克利特

本文探讨一种关于美与人文文化的研究方法：兼美描述分析法。它本质上属于风格研究。

人文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一个性格、风格的问题。文学性格、美学品格和文化风格都是一种“兼美”系统，一个兼融的结构，不管是古典的或现代的，个人的或地域的，民族的或全人类的。

对性格、风格、文化的认知表述有三个层面：描写、分析、归纳。归纳是大而统之的定名称呼，如豪放风格，英雄风格，清教文化，只作为一种类型来泛指。归纳总是共性的，不适宜个别定性，这就需要分析，锱铢必较地辨异定性。人文学者常常发挥天才的直观审美，以惊人的直觉印象批评进行体验式的表述。三个层面的认知表述往往各擅胜场。但于中国人而言，往往习于模糊描述与诗性归纳，疏于精密分析，而导致争议纷讼，例如宋词风格的分类问题。风格学其实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类型划分问题，它的背后是人性文化与心理内涵的复杂性，舍分析而别无它路。

今日的世界，对人的性格、审美风格、文化特征的分析等人文研究已经到了高度关注且十分成熟的阶段。关于美的复杂

性研究，现代化中的文化内涵研究，文明的冲突的研究课题都已成为显学。一切皆因为人类文化到了一个“复杂化的现代”阶段。一群科学家聚集到一个叫做桑塔·费研究所，来研究关于“复杂”的哲学。（见[美]沃德罗普《复杂——走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现代以来“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生存—思维的中心话语，人类的一切境界的复杂性，只有用“文化”这一概念才能涵括之。科学家研究“复杂”的哲学，人文学者也应当研究文化的结构分析方法。

复杂的文化模式和美的风格境界必然是一个兼融性的结构，其中有客体与主体、肉与灵、人性与相对的个别性、宏观中观微观的地域性、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等各种文化因子和审美因子融合其间，这结构既有秩序，又有混沌的边缘，并且有融合整合的机制。探讨描述分析的方法，趣味无穷，并且富有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论述什么叫兼美，接着分析归纳审美因子，然后探讨兼美的结构模型，最后论述兼美风格的鉴赏辨别法则。分析的对象以美学为主，兼及文化，既是风格美学论题，也是文化学论题，因为笔者认为，文学艺术的风格美学问题与人文文化不可分割。本文将重点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

一 什么叫兼美？

什么叫兼美？最简练的描写就是苏东坡的两句诗：“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①人类文化触目都是兼美的好例子。例如中国名酒茅台酒体醇厚丰满，令人回味悠长，据分析测定，茅台酒香的成分极为丰富复杂，有脂类、醇类、羰基化合物、酚系化合物、有机酸等等数百种。以酒香美味来比证美

学、文化风格实在很恰当，美味的品种是不可穷尽的，但每一种又不重复，整体不重复，其中却有部分交叉重合。品尝一种食物要体味它的独特味道，还希望它的美味是最优化的，并且是味道丰厚。同样道理，审“美”必以“丰美”为兴发的基础，丰美即兼美，美以体验追究意味为目的，兼美的至高境界有三点要求：

1. 奇异新鲜独创；
2. 意味组合最优化；
3. 意味无限，趣致生生不已。

以此来批评文学艺术文化产品，我们自有大量实证。例如日本产铃木小吉普越野车，把粗糙的越野车城市化得相当漂亮，但仍能使开车的人自我感觉很有男人味，人称这是“野性见妩媚，粗犷含斯文”。有一位美籍华裔服装设计师维维恩·谭说：“我主张搞一些交叉文化设计。”她把一种典型的中国的色彩艳丽的牡丹花图案，用黑白两色印在预先打了褶的聚脂乔其纱面料上，把典型的中国刺绣蝴蝶和花朵加在编织服装和尼龙服装上。她成功了，她的作品被抢购一空。事实上现在亚洲的，拉美的和印度的时装设计师也已把他们独特的美学特征注入到欧美的时装潮流中，创新常常在于此种边缘组合。回过头来我们听一听音乐作品：美国萨克斯管大师 kenny G. 近几年来频频取材于中国小调，以东方含蓄的风韵渗入他潇洒空灵的吹奏中，他改编的江南小调《茉莉花》给全球华人一个惊喜，那竟是如此舒缓如此潇洒，忧郁得有点偏向温馨轻渺，全无原来乡间小调的轻松明快和乡土味的单调，使东方色彩和西方的华贵、雍容、温馨融为一体。本来中国的一些民乐和小曲因长期的习惯形成了“尖利，缺少多层次的和弦音乐”等缺点，高胡音乐家余其伟先生曾说：“中国民乐需要和弦。”因此 kenny G.

以西洋乐器的优势参之以中国民乐和小曲的动听，刚柔相济，东西文化交融，因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和弦”就是“兼美”的最好表述之一。

兼美，是风格美学的关键字眼，“风格即文化的符号系统的统一体与整体”^②。风格是对人文文化现象的整体观照、体认、概括、标记。这个概念是综合性的，就象《庄子·应帝王》中说的中央之帝“混沌”，浑沌也者，乃世界生成之前的状态，也是《列子天瑞》所言的“浑沦”：“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沌是一个圆满的活的生命整体。有初级的浑沌，那是单质的单调的一种圆满之美。但人类的文明境界是超越进化的“文化”之浑沌，是高级的人文文化生命，是复杂整体构成协调的结构。人类文化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在边缘开放重组中创新的风格。审美情感在高度复杂的复合状态中比在单纯状态中具有更大的价值，美就意味着许多不同特征的结合。如果只是显得有力量，而缺乏风雅等等其他的东西，那并不能算作美。人文文化胜于自然存在的就在于兼融创造，创造出自然原来没有的东西（自然界中大量兼美现象，兼美本是自然规律，人类领悟于自然兼美而运用于文化创造），文学艺术、美学就是源于自然而经过兼融创造高于自然。一个袅娜优雅的女子穿上军装，既保有风骚妩媚，又有俊武飒爽的英气，就显出了“第三种美”。天下的女子都以“优美”为基质核心，但各地的女性美却带有不同的风韵，善于美化自己素质的女子就会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风韵里兼融一些卓异的内涵：保留一份文化传统，装饰一份民族风情，表现一份地域品格，流露个人的独特气质，再兼之以国际文化的品味。比起一位单纯朴实的“村姑”来，这种兼美风韵是更耐人鉴赏的。这种兼美是一种“混匀”组合，是别具匠心的创造，而不是“平均”。英国心

理学家选取了 60 张英国姑娘的照片，用计算机处理得到一张具有英国姑娘综合特点的“平均”面孔照片，再挑选 15 张大家公认的美女照片，进行“混匀”处理，得到一张照片，然后通过专用程序区分“混匀”面孔照片与“平均”面孔照片的偏差，结果发现偏差增大到 50%。拿这两张照片给男子看，男子均表示更喜爱“混匀”面孔，在日本做这个试验，结果一样。这个例子说明，兼美是一种比单纯自然的美更优化的风格，一方面它有多样性的丰富意味，另一方面它具有最优因子、最优化组合，因此有更高层的“质”，包括整体性的优势和独特性的优势。即使一个人的素质也是这样，吴尔芙说：

“一个人，如果是个纯粹的男人或是个纯粹的女人，那将是天大的不幸，无论任何人，都应该是个具有女人味的男人或是具有男人味的女人。”美国的门肯甚至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不蕴涵一点异性的特征，就不可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这些见解后来为荣格的男子灵魂中的阴性气质和女子灵魂中的阳性气质之理论所证明。当然，兼美是有最优化组合的准则的，这里只不过是证明兼美优于自然美，兼美之胜在于优化组合。

为了说明这种兼融创造的实践过程，我们再举两个例子：美国现代舞开创者邓肯说她怎样创造那传播于世的“希腊舞”：她看到外祖母跳的爱尔兰快步舞里混合着西部开拓者同印第安人进行战斗时的那种英勇气概，也许还掺杂着一些印第安人土风舞的舞姿，还有一点外祖父托马斯·格雷上校从南北战争前线回来时一路上哼的《扬基歌》的味道。于是她跟外祖母学会跳这种舞，同时加进了自己对年轻的美国所怀有的强烈情感，最后又融进了她从惠特曼诗句里领略到的对生活的大彻大悟。所谓的“希腊舞”就是这样兼融着艺术与文化的质素创

造出来的^③。这正如叶燮所说：“然孤芳独美，不如集众芳以为美，待乎集事在乎人者也。夫众芳非各有美，即美之类而集之。集之云者，生之植之，养之培之，使天地之芳无遗美，而其美始大。”^④为什么“集众芳以为美其美始大”呢？请看奥地利心理学家艾伦费斯的一个例子：他演奏一支由六个乐音组成的熟悉曲子，尽管作了一些改变，在音色、音质、音程上加以变化，或用钢琴，或用中国竹笛演奏，但还是这支曲子，结果音乐韵味显然不同。他说这里一定有比六个乐音的总和更多的东西，即第七种东西，也就是形一质，原来六个音的“格式塔质”，正是这第七个因素使人们认识已经变了调的曲子^⑤。这就是中国人叫“神”、“韵”、“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东西。

以上说的是兼美的创造性融合，其实对美的对象的鉴赏也是一种兼融的体验分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人们欣赏美的对象，总是用为自己所共鸣的质素来发展对象美感的光圈，这种光圈越丰富，就越有联想力，就越有新奇刺激和情感共鸣，审美对象的兼美因素越丰融，它的“召唤”力就越能充分调动欣赏者的美感储备，他就越发感到趣味横溢，就觉得这主体的核心具有圆形的多侧面，有无穷的审美张力，在这核心诗意的边缘，还有野逸的美、柔媚的美、色彩华茂斑斓的美、风姿绰约的美、幽默的美。在美的核心之外，它的多余部分容易使情感的性质变得混杂，互为烘托映衬，使此味已不仅仅是此味，而兼有了彼味。我们暂且先将这看作是例外的物品，一个幻想物，有时它给人升华的趋势，有时它给人酝酿氛围的心理诱惑，有时它给人暗示的导向，每一个侧面都提供了线索，经过多面的渗透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有节奏韵律的伟大浑厚的整体。在兼美感动下，我们觉得我们的精神世界博大开放，一个

文明的诗意的灵魂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此，对兼美的审美鉴赏需要进行细致辨析体验。例如对丑小鸭的形象，我个人感觉到当丑小鸭在悲伤自卑之中带着不屈的反抗，在感到无奈可怜之时感到一种委屈，要追求自我的价值，坚持要有一种个人的意见，但在向往兴奋之中又有一种茫然，在幸福和成功的顶峰感到一些忧郁和羞涩，我觉得这个形象与我的人性的全部发生了立体的共鸣。又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美人在纯洁清新的美中带一点儿狡黠和妩媚，在天真稚气中带一些儿调皮甚至无意识的性感呈示以至爱的挑逗，我们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美的生命。这犹如听长笛的音质，悠扬中有一些颤声，清亮中有一份沙音，悠远但回环，轻快而温存，优美且伤怀。听出了这些，你才说具有了音乐的耳朵。弗洛伊德在分析《蒙娜丽莎》的美感时说：“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结合着两种不同的因素，这一思想打动了好些批评家。因此，他们在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发现了那种支配着女性性生活的冲突的最完美的表现——冲突在于节制和诱惑之间，在于最诚挚的温情与最无情地贪婪的情欲（贪婪地要毁灭男人，似乎他们是具有敌意的存在）之间。下面是蒙茨的观点（1899）：‘我们知道，将近四个世纪，蒙娜·丽莎·吉奥孔多在拥挤在她面前的赞美者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迷人的不解之谜。没有一位艺术家曾经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女性的本质：温情和媚态，端庄和秘密的感官快乐，那所有的神秘性，孤零零的心，深思的大脑，一种克己的、只表露了喜悦神情的个性。’意大利作家安格罗·孔蒂看到卢浮宫里的这幅画在一束阳光下更充满了生气：‘这位夫人在庄严的宁静中微笑着；她的征服的本能、邪恶的本能、女性的种种遗传、诱惑和俘获其他人的意志、欺骗的魅力、隐藏着残酷目的的仁慈——所有这些依次隐现于微笑的面

纱的后面，埋藏在她的微笑的诗中……好的和坏的，残忍的和同情的，优美的和奸诈的，她笑着……’”^⑥

兼美的内涵这样复杂，在审美鉴赏的批评时，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体验便会产生不同的分析。这种纯粹直觉体验的审美描写显然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不利于建立科学的审美方法，因此有必要结合分析和归纳的方法。首先应当确认文学性格、艺术风格、文化特征是一个兼美结构，然后分析与归纳其中的结构因子与结构类型，只有当直觉品味与分析、归纳方法综合运用时，审美批评和文化内涵分析才是令人信服的。文艺史和文化史上创造了数之不尽的经典作品，今天人类继续创造着新的文学艺术文化作品，包括生活艺术、娱乐艺术、环境艺术、人体艺术、文本艺术等等，更包括人性的心理的文化模式，时时刻刻这种兼融创造与兼美分析都在发生着，演绎着。兼美作为一种构造方法与鉴赏方法，实在值得作一番解剖研究，下面试图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探讨。

二 风格的类型与结构因子

文学性格、美学风格和文化特征都是一种兼美结构，创造它们与鉴赏它们必须掌握它们的结构。例如有人说，宋江的形象实由三种成分构成：一为“山大王”身份，此乃与生俱来，无可更改；二为“义侠领袖”，此为作家创造，变为性格基调，与主要情节密切相关，是宋江形象的光彩所在；三为“忠孝楷模”，此为作家的超我干预所致。这一分析难以得到施耐庵的确证，但文学文化研究可以通过大量证据分析归纳把握规律，为文化创新提供方法论。上述的分析就是对宋江形象的结构解密，作者分出结构因子，指出第二种成分乃《史记·游侠

列传》中的郭解，即文学上的文化原型，而第三种成分则是中国专制政治文化中的另一种原型^⑦。分析结构因子，归纳结构类型，这是结构主义方法。

所谓结构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对结构的感知和描绘极为关注，结构是自维柯以来的现代思想家所日益关心的问题。皮亚杰给“结构”的定义是：人们可以在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中观察到结构，这种排列组合体现下列基本概念：整体性概念—转换概念—自我调节概念。

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首先确定该系统的基本因素（或元素），然后按它们的组合变化列成模式，最后探究其间的关联，概括出结构法则。这种方法是自然科学家常用的，但在人文学领域却遇到了复杂纠缠的困难。要确定人文文化的元素相当困难，结构主义者按照语言学的方法来规定构成文学系统的诸种元素。

要研究人的性格和文学性格类型，首先应确立基本的性格元素，我国3世纪初的学者刘劭在《人物志》中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自我的追寻》中也分析过各种性格元素，今天的心理性格测验都是以性格元素作基础进行的。虽然分析是科学的，但如果对一个人用性格元素简单贴标签、定性则不符合人文学的规律。在对文学典型研究的过程中，前人同样已经总结出了人物性格的原型因子，前苏联作家谢·扎雷金说：“经典文学著作已完成了了不起的工作，如同门捷列夫制定了元素周期表一样，它已发现并绘制了人物典型和人物性格的丰富画廊。”“目前每个文明国家都已拥有自己民族文学人物的名单。而且一般来讲，人数并不多，可能有一百个，也许有二百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多种性格。因此只要阅读、理解并审记二三百本，至多一千本